

评点

批评家在线

今天我们怎么做父亲

——观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 □胡一峰



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大结局的这天,恰逢鲁迅先生诞辰。巧的是,距离先生发表《我们怎样做父亲》,恰巧有100年。《我和我的儿女们》以电视艺术的形式创造了钱广这一“中国式父亲”新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先生提出的问题,带给人许多感动,也带给人不少思考。

该剧第一集围绕房子的“热开场”,场面火爆。老父亲钱广把女儿钱文静买给自己的房子过户给了儿子冯立业,招来钱文静一肚子怨气,围绕一个房本,几方“势力”展开了斗争。几个回合下来,钱广的“老谋深算”、文静的火爆泼辣、立业的老实质朴、立业媳妇黄玉华的算计小气、文静老公孙涛的大度善良,以及钱广夫人董丽芳的温婉贤惠,悉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同时,这也给观众留下了一连串疑问:为什么老钱家的长子不姓钱?钱文静和孙涛学历不高,怎么挣得如此大的家业?钱广对孩子为何嬉皮笑脸,没有传统意义上“父亲”的威严?让观众有了追剧的欲望。

如果要找一个切口,最直接地窥见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最好的选择肯定是房子。剧中通过老钱家儿女争夺“房本”这一线头,抽出了一连串的事儿。老钱家也就随之成了社会现状的一处缩影景观:孙子上学需要学区房,小儿子钱自强当网红“不务正业”,二女儿安安离婚成了大龄剩女,冯立业一家从乡下进城之后生活水准

堪忧,黄玉华学历低、就业难只好摆地摊,老妈媳妇患了癌症没钱治病等等,他们背后折射的是社会转型期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如城乡差距、教育不均衡、看病难、就业难、网络新力量崛起、代际观念冲突。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家庭会一下子集中这么多麻烦事,但种种麻烦事确实是中国人的切身感受。

当剧中演员以轻喜剧的风格、生活化的表演把这些家长里短表现出来时,全剧顿时给人以“接地气”之感,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屏幕里的人似乎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都有“钱广”“董丽芳”“冯立业”“黄玉华”“钱文静”“钱广安”,正是他们支撑起了我们真实的生活,给我们欢笑,也让我们悲伤,向我们伸出过援手,也让我们气不打一处来,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看他们的生活故事,就是看我们亲友的喜怒哀乐,也就是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些故事虽平淡琐碎,却让人感同身受,并在不经意间获得小小的感动,抑或淡淡的哀愁。

不过,火爆的开篇之后,该剧走入了瓶颈。在长达10集左右的篇幅里,发生在老钱和儿女们身上的冲突不少,大概两三集必有一次,这大概符合某种编剧理论。遗憾的是,每次冲突在结构上过于相似,而且每一次冲突通过“思想工作”或钱广施小计就解决了,也没有留下“后遗症”,只要话一说开,所有人都通情达理地理解了对方,愉快地准备迎接下一个矛盾的到来。以至于

像孙涛这样精彩的角色,在前十几集中完全沦为钱文静解决老钱家种种矛盾的提款机。如果以追完全剧的“后视之明”来看,这些小冲突也起到了为后面的高潮作铺垫,以及更充分地展示人物性格的作用,但从观众当时的观感而言,剧情陷入“单曲循环”,令人有疲沓之感。

比如,当钱自强斥责母亲为了照顾钱家两个女儿,对他不够关心时,因为钱自强是随母亲嫁到钱家的,作为观众,我十分期待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看到一场好戏。不料,“思想工作”再一次发挥了无比威力,结果又是一次平安的软着陆。由于缺乏高峰性的冲突,这一部分剧集成了一片起伏不大的丘陵,应有的张力不够强大,审美空间也不够开阔。

幸好,剧情进展到后半时,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前半部分闹得挺欢的钱广,渐渐隐退到后台。他的儿女们则开始面对自己人生中的问题。就像钱广的孩子们在该剧的后半部分才长大一样,这部剧本身到了后半部分才如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脱胎换骨。

钱安安的生日刘晓明回国探亲,她的前夫高远也从美国回来并和安安成了同事。面对两个曾经抛弃过自己的人,钱安安该如何安放她内心深处的亲情与爱情,一条拷问人性的故事线索就此展开。孙涛和钱文静走上前台,不再是拿着提款机充当钱广的救火队长,由于记者徐海鸥的出现,这对同患难的夫妻因为投资等问题而产生信任危机,爆发激烈争论,乃至家庭都走到了破裂的边缘。钱自强和刘菁菁的感情一直阴晴不定,寻找隐姓埋名的大善人“桃李万山”的机缘,给了两人重新认识对方、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认识人生的机会。冯立业遭遇汽车行业恶性竞争带来的碰瓷诈骗,这个处于弱势、自卑状态的人物,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他以高超的修车技艺,不但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挽救了孙涛的4S店,而且以工匠精神 and 正义感,狙击了不正当竞争和犯罪行为。钱广的4个儿女在“剧”的意义长大了,他们不再是需要钱广用“计谋”哄着的孩子。同时,作为剧中人,他们担负起了角色应

有的使命,使这部剧展现出动人的内涵。

三

几千年传承的伦理文化为中国家庭伦理题材影视剧推出精品奠定了基础。不过,我们的家庭伦理题材文艺作品中,讴歌母爱的不少,描写父爱的不多。没有突破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对“父亲”的本质规定。《我和我的儿女们》中的父亲钱广实现了一次突破,他以对子女真挚、热烈的情感,以及对世界善良真诚的大爱,重新诠释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父爱,建构了一个以亲情为基础、以责任为内涵,“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国父亲形象。这也表现出创作者对传统文化及其转型发展的洞见。

剧中,钱广一度为了维系他所理解的“家庭真情”,希望“损有余以补不足”,用亲情或刻意制造的亲情来弥合因为贫富、阶层、地位等不同而带来的隔阂,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不惜组织老街坊帮安安制作的网络综艺点击率,不惜扮作小姑娘和钱自强网恋,还不惜制造假房产证以图弥合钱文静和冯立业之间的矛盾,却经常帮倒忙。渐渐地,钱广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在尊重孩子们选择的基础上,用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经验而不是“计谋”来给孩子们智慧启迪和精神力量。在全剧的最后,不但钱广的儿女们实现了人生的升华,钱广的形象也再一次刷新,原来他就是长期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桃李万山”。当钱广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过往的历史被悄然揭开,当下的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听到钱广说他只想做一个不被打扰的好人时,一种感动在我心中涌起。钱广不但是一位好父亲,更是一位好人。或者说,正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才是一个好父亲。

《我和我的儿女们》有得有失,总的来说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作品,也是值得思考的作品,这种思考不但指向如何以艺术的手段和时代的眼光,沉下心来开掘好家庭伦理题材这座中国文化赐予我们的富矿,而且指向如何在新时代革新我们的家庭伦理,做好父母,也做好儿女。



真情付出终能真正受益

——评电影《受益人》

□彭流莹

电影《受益人》主要围绕“杀妻骗保”和骗婚“假戏真做”两个线索展开。从新闻事实借鉴而来,使得这个电影故事的现实存在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电影中把看网吧的、跑代驾的、做直播的网红、房地产销售和挪用公款的会计等现代社会职业身份进行了糅合,人生的现实困境可能千篇一律,但是每个小人物的故事却有千秋,但是也因为新闻事实中人物身份的这种自由度比较高,所以更有益于影视文本的改编,可以让这种戏剧性和创造性在电影体裁的框架中得到自由发挥。

新闻事实指涉的热点不仅是民生关注的聚焦点,一直以来也是电影创作的重要源泉。一个挪用公款买了17套房的会计,一个最大梦想就是为儿子买一套房的小老百姓,这个事点触到了这个时代的痛。在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人文关怀是很具体的。人物设置上,该片没有推己及人的道德理想,也没有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和担负。相对而言,它跟《我不是药神》还有着较大的区别。

电影创作不仅在叙事上要有贴合于电影影像的一个图景式的把握,从个人生活小情小我状态的描摹到社会发展的缩影,对于价值观的传递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矫正。影片最后的剧情设计浪子回头,悬崖勒马,恶人恶行虽然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在女性情感的补偿方面,作恶的男性付出的代价实在太低。究竟女性的结局源于对套路的认知不清,还是情感真实就是女性人生所期待的日常呢?

女演员柳岩明显是将自己演艺和生活的真实片段融入到了网红主播的这个角色演绎之中,当然,这也是一个适合她个人进行风格发散的角色。所以,在该片中她不再是一个花瓶式的符号,而是有骨架有血肉的人物,并且凭借这一角色的真诚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直播卸妆告别网红生涯的那场戏,将柳岩爽快自嘲的气质进一步提升。演员跟角色合二为一,戏内与戏外相互融合,这种独特而精巧的表达式成为影片获得大众信任和引起观者共鸣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影片的重要特质。

杀妻骗保的故事本来应该算是对于人性恶的一种极致的展现,张子贤饰演的“大笨钟”代表了影片中恶的集合。他不但自己在做违法之事,而且一直在施行魔鬼计划,屡屡要将吴海拖过违法的边界。我们常说,黑色幽默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幽默。张子贤的表演很有质感也具备一定的张力,他演活了这种绝望状态下的幽默,也演活了那种贪婪自私的坏人。

大鹏在该片中的表演确实很实用,但是,他本人自身的特质太过闪亮,尤其是他的眼睛,总在不知不觉中掠过一丝光芒。所以,他要塑造一个憨笨的形象让观众接受并信服,难度系数不小。不过,影片开场对假口供的戏,代入感很强,反转也很让人惊叹,两个演员的表演感情状态很饱满,这种喜悦的产生确实是需要演员有积淀的。

片中的重庆方言语调软糯有弹性,语言的幽默感也随之而来。而柳岩的湖南方言与普通话混杂所带来的娱乐化效果,也赋予了电影新鲜的观赏体验:直爽、干脆、火辣,尾音上扬还带着一丝丝妖娆。方言本来就是地域文化符号的一种,原汁原味的方言的使用需要人物在这个特定空间有一定生活背景。使用方言能够给电影带来客观纪实的效果,也符合城镇居民形象刻画的需要。

黑色幽默元素带来的本就是喜剧气质和荒诞风格,电影当中也是将各种元素互相拼接。整个电影看下来像很多个包袱串联而成的相声,但这种串联并非一种自然状态,就像手串和手镯,它们的质地和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为青年导演的长篇处女作,这部电影的完成度较为纯熟的。从对假口供的戏中戏结构,到使用行车记录仪的形式复盘犯罪过程,无不反映了创作者别出心裁的构思。片中几个围追堵截的诙谐场面,也搭配了契合的音乐来烘托笑点。最终,小网红成了海南钻石湾的房产销售员,在新房的阳台上眺望大海,出狱后的吴海正好站在她视线穿过的望远镜里,也“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后这些“无声胜有声”的镜头组合,更是彰显出导演对视听语言设计的巧妙心思。

导演申奥在某节目访谈时曾提及对做这部电影的一些希望:“投资人能收回成本,观众看得过去。”因为目的单纯,导演并没有太多地执著于艺术的挣扎,影片目前来看也确实取得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可。在很多青年导演还在反复强调自己对纯粹艺术的追求,还没设法顺利完成一部合格完整作品之时,申奥能够认识到电影艺术所具有的多重属性,果敢地尝试艺术跟商业的结合,不得不说,“坏猴子”的商业电影模式还是对这批年轻导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不过,导演的创作理念与作品的现实主义关注其实已经决定了一部电影的基调。作为一个类型片,导演的个人化风格不明显,拼贴戏仿的元素组织中,为商业而商业,导致有些对宁浩导演模仿的痕迹较重。从路阳的《绣春刀》、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到现在的这一部《受益人》,可以看出每一位青年导演都为电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和电影本身的商业属性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如何在接下来的作品中,创作出拥有自己独特个性,或者说具备作者风格的好电影,还需要青年导演们继续心有理想,脚踏实地,开拓一段壮丽征程。

边看边说

《谍战深海之惊蛰》开播以来引发观众热议,剧中不仅有惊心动魄的谍战情节,也展现了轻松的生活日常,种种尝试为谍战题材影视作品创新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生动案例。

创作明暗点交织。“找亮点容易,找暗点难”。没有暗点,画面一片高光,人物不够立体;暗点多了,阴影面积太大,又容易造成反面效果。所以,找亮点不是本事,找到衬托英雄恰到好处的暗点才是高手。在《谍战深海之惊蛰》中,陈山作为一名街头小人物的出场,首先呈现了人物的暗点。接下来角色的出生入死,则采用“小逆模式”,即在舆论的传播谱系里,次主流舆论在价值观上是主流,在表现方式或性格语言等方面有小小的叛逆,达成容易传播的效果。这也极大地契合了主要人物陈山的性格特征。

剧情设计旗鼓相当。在以往的谍战剧中,英雄角色常常被塑造成无所不能的人。但物极必反,敌人一旦被描写得不堪一击,英雄就被贬低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所以,英雄的对立面必须塑造成沧海横流中的典型代表。在戏剧冲突与角色冲突上,该剧没有矮化敌人,而是通过描写对手的强大,让英雄不再是百战百胜的“云端人物”,而是在一次次考验和战斗中逐渐成长和强大起来,无形中拉近了观众同剧中人物的距离。

谍战剧中的英雄要与敌人斗智斗勇,不仅要拼智商、拼情商,而且还要过五关斩六将,不断增加难度系数。这样的过关设计,如果敌人全是傻弱软,剧情根本无法展开与推进。《潜伏》中的李涯、吴站长、陆桥山,《麻雀》中的毕忠良,《谍战深海之惊蛰》中的荒木惟、周海潮等,这些横流中看似了不得的敌人,恰恰衬托出余则成、陈深、陈山等英雄的不得了。

英雄性格与英雄形象的立体化塑造。该剧还有两个特别有震撼力的要素:一个是英雄性格,一个是英雄形象。

所有的英雄都具备一种“走在人流反向”的性格,这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这种性格最动人的不是气概,而是选择。生死关头,英雄会选择走在死亡概率最大的方向;在舒适区与危险区,英雄会选择站在最不利于自己的位置;在自己与别人的幸福之间,英雄会选择把幸福让渡给别人。就像陈山为了妹妹的性命安危,不顾性命卷入地下战争、被迫成为日本间谍;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处于三重身份、高压紧张形势下,他,视死如归同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在个人命运与家国大义面前,战胜回归平静的贪图安逸之



《谍战深海之惊蛰》的新意所在

□邹振东

心,毅然决然选择加入抗战阵营。

绝大部分谍战剧都是英雄自愿打入敌人内部,但在《惊蛰》里,陈山却是被动卷入“千万人”之中,这就为情节的曲折与人物的变化埋下了值得期待的伏笔。最初,陈山因为酷似军统特工肖正国而被日本特务荒木惟看中,荒木惟用陈山的妹妹陈夏威胁,陈山为了解救妹妹被迫成为日本间谍。这时陈山所展现的还是普通人面对亲情会做的选择。随着剧情推进,陈山逐渐成长,他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也慢慢觉醒。这时的陈山不再甘当日本间谍,而是逐渐坚定信仰并找机会“反扑”,在荒木惟要求毒害飞虎队队员时,陈山经过挣扎,最终依靠自己的智慧,在保全自己的同时,保护了飞虎队队员。

这样的出场设计是谍战剧中少见的。一般来说,谍战剧的英雄一出场就是英雄,后来不过是其能力进一步提升、信仰更加坚定、历险更加丰富的过程,人物自我变化的空间有限。但一个小人物的初始人设让剧中的角色有了成长的空间与曲折,从而产生人物弧光。

为有牺牲多壮志,牺牲是英雄题材的标配。如果这个牺牲者是英雄自己或其挚爱的人,其震撼力就更加强烈。谍战剧里的英雄,比别的题材英雄牺牲得更多,除了生命,还包括良心折磨、角色冲突、忍辱负重、隐姓埋名,特别是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爱情与亲情所带来的冲击力更大。《谍战深海之惊蛰》里的牺牲会是什么?是陈山和陈夏的兄妹亲情,还是陈山和余小晚的“夫妻感情”,亦或是陈山和张离的惺惺相惜?从小人物成长起来的陈山,身上也背负了更多普通人可能遇到的抉择和冲突。于无声处听惊雷,从细微处见真章,他们最后的牺牲和抉择越发显得可贵和伟大,而这正是剧集吸引观众持续关注核心要义。

专家热议中国电影市场现状与未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的第27期影视大讲堂在京举行。本期大讲堂的主题为“中国电影市场的现状与未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出品方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副总经理黄群飞、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担任主讲,影视所所长丁亚平主持,部分影视所在职科研人员参与对话。

丁亚平谈到,2019年中国电影呈现出可喜变化,至今城市银幕数超过67000块,成为全球银幕数量最多的国家。刚刚过去的国庆档,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国产影片的带动下,中国电影市场再次实现飞跃,档期总票房超过50亿人民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电影市场也存在天价片酬、偷漏票房、发行垄断等问题,如何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还有很多值得检视、反思的问题。黄群飞谈到,中国电影票房连年高升,制片数量位居世界前三,但电影大国不等于电影强国。黄群飞从电影产业的收入过度依赖票房、中国电影的海外发展困境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电影市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中国电影亟待完善工业化体系,电影市场环境需要得到进一步净化。与会专家纷纷表示,中国观众基于观影经验的积累,审美趣味和标准已发生巨大变化,票房保证不再是肤浅的商业元素,而是扎实的电影内容。(许莹)

电影《歌声的翅膀》:歌舞类型片的新探索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的音乐歌舞片《歌声的翅膀》11月1日在京举行专家研讨会。该片讲述了3个不同民族的年轻人,怀揣音乐梦想,行走天山南北、戈壁草原、乡村城市,从各民族丰厚的音乐舞蹈资源中,从各族群众火热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和素材,最终实现音乐梦想的动人故事。与会专家表示,影片以音乐歌舞的艺术形式将新时代新疆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集中展现,同时全景式呈现了新疆五彩斑斓的山川大地、异彩纷呈的民风民俗,是一部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作品。

《歌声的翅膀》是继《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歌》《昆仑兄弟》之后又一重要的新疆题材电影。专家谈到,该片紧紧围绕青春励志和坚守梦想的题旨,时代特色鲜明,文化象征意义明晰,是对新疆自然美和文化社会美的一次艺术发现。在叙事上,该片以人物为重,意境是唯美的,不仅描绘了自然的景象,还写出了内心和精神的走向,把美丽的新疆风光和浓郁的多民族风情、多民族歌舞形象与思想内涵艺术化地结合在一起,是中国音乐歌舞影片的一个重要探索。同时,与会者建议,该片的主题表达可以更加鲜明,爱情线可以设计得更动人一些,歌舞与角色、情节的结合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余非)